

随庵唐宋石刻碑志的收藏与校讎*

李 弘 毅

徐乃昌(号随庵)是生活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的一位著名收藏家。西南大学图书馆藏稿本《徐乃昌日记》民国十年壬戌(1922)十月十四日记载:“乞顾西半先生麟士绘《随庵读碑图》。沈乙盦尚书^①题诗曰:‘秋馆读碑图,秋心炯自如。尚方真子镜,骑省当家书。仙思籀王母,兵家感将渠。随庵随石墨,随桐即山居。’”^②末题徐斋居士七十二岁书,盖辛酉秋所作。”从乙盦题诗中可看出,传世文献和出土史料均属于随庵重点收藏并加以校讎的史料,其收藏规模和校讎成果曾受到了时贤关注^③。而唐宋石刻碑志就是随庵重点收藏和研究的文献之一种。

一、随庵的唐代碑志收藏与整理

随庵对于石刻碑志的蒐辑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乡邦文献来进行的。依据《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所记录的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到了以下史料:

碑名	刻碑年代	碑刻来源及收藏记录情况
《宣州刺史陶大举德政碑》	永昌元年	当涂县丹阳镇南禅那院
《薛缙石刻残字》	长安四年	石出河南陕州,今藏贵池刘氏
《大房山孔水投龙璧记》	开元二十七年	石出顺天房山,今藏贵池刘氏
《成果寺常住田碑记》	天宝十一年	在宿州县
《谦卦爻辞》		在芜湖县文庙

* 本文系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随庵金石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A870009)成果之一。

①沈乙盦,即嘉兴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因其学问深厚,见识雄伟,被称为清代一大宗师,官至尚书,《清史稿》有传。乙盦尤嗜金石,精于鉴别,对碑版、古籍和书画等独具法眼。

②该诗不见于《海日楼题跋》、《沈曾植年谱长编》等文献,应属于乙盦之遗诗。

③关于此问题在《观堂集林》、《贞松堂老遗稿人甲乙丙集》、《艺风堂文集》和《小校经阁金文拓片》等时贤著作中多有记载,本文不再详述。

《济阳郡蔡夫人墓志》	大□三年	潜山县北黄山出土,今藏王访陆氏
《萧府君墓志铭》	永贞元年	在宣城县
《张府君墓志铭》	元和二年	寿县西北菱角嘴出土,今藏霍邱刘氏亦园
《施昭墓志铭》	元和四年	在泾县赵氏
《高霞寓玄堂铭》	大和八年	石出昌平县,今藏南陵徐氏
《绛州翼城县令薛公墓铭》	开成五年	在凤台县
《牛尹甫墓志铭》	会昌二年	寿县西北菱角嘴出土,今藏霍邱刘氏亦园
《范阳卢氏室女墓铭》	咸通八年	石出洛阳,今藏南陵徐氏
《寿州严公墓志》	咸通五年	在寿县,孙氏《小岬谷别集》
《达奚公墓志铭》	咸通八年	在寿县孙氏
《润宣二州界碑》		在当涂县慈湖镇
《宣州重建小厅记》	乾宁二年	在宣城县
《千佛寺残碑》		在凤台县
《广平程公墓铭盖》		在寿县正阳镇学宫正殿西壁

按照列表分析,可归纳为以下特点:

第一、以是书蒐辑到的 19 件唐代石刻史料看,包括了墓志、寺庙碑和界碑等。编纂者对于史料来源、出土收藏情况,以及碑刻的尺寸大小、书体风格和人们对它的记录考释情况都做了详细记录。

第二、利用地方志来考证亡佚了的唐人碑志,是随庵校讎唐代碑志的又一突出之点。他在《绛州翼城县令薛公墓铭》的《校勘记》里写到:碑铭原“在凤台县。石高一尺三寸,广一尺四寸,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二十五字不等,正书。拓本未见,据《凤台县志》录入”。由此可证明,他对该地区中的乡邦文献非常熟悉。

第三、《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是随庵整理编纂《安徽通志》的阶段性成果,仅就笔者对其史料梳理看,是书并非揭示安徽金石史料的全书,存在遗漏,如《唐佛顶尊胜陀罗经石幢》、《唐河东薛公墓》和《唐千佛寺残碑》就未见有记录^①。回顾其编纂过程,随庵说:“金石古物原以所见墨本为主,编纂伊始,先据潜山、桐城、贵池、当涂、南陵五县全份从事撰集,并分向国立北平图书馆暨海内金石家藏本次第传录,而志馆复将全省金石编目分致各县访拓,至上年五月后,始有陆续送馆者,太平陈君祖荫、石埭苏君纬之、桐城王君访陆,详加采访,致力尤勤。其泾县、怀远、凤台、盱眙等县摩崖题名较多,限于天灾人事,以致未能遍加访拓,今据各县志所载者录入。”^②方志整理与编纂是一项费事、费力细致工程,仅凭借一己之力,颇难以实现。安徽地区文化遗存很厚重,更非短期间能够“遍加访拓”,即使编纂者尽力为之,也仍会遇到些预想不到

①《光绪凤台县志》卷十九著录。

②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例目》,民国间安徽通志馆印本。

的“天灾人事”。以今日之学术眼光来看,凡是从事一项浩大工程出现些遗漏和不足也是很难避免的,更何况是整理历史文化遗存。

《南陵县志·金石志》中也收录了一些为《旧唐书》、《新唐书》等传世文献记录不全的碑志史料,诸如《唐南陵修大龙陂记》就是其中之一。该碑志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唐代南陵地区的山川、民俗和物产,以及社会民情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该地区历史的重要参考史料。校讎记中写到:“右记唐元和八年韦瓘撰文,见《府志·金石目》及王象之《舆地纪胜·碑目》、赵绍祖《安徽金石略》。碑石久佚,据徐《志·艺文录》补。顺阳范君者,范传正。元和中以宁国令摄南陵,修大龙陂,而后人思之,故请立碑,而韦瓘为之记也。连率范公领宣部者,当是范传式,为宣歙观察使,故称传正为伯氏也。传正《唐书》有《传》,而不载其为令之绩,此亦可以补史之阙。”^①校勘记从地方志叙述的角度来考证碑文记载的情况,并指出了官修正史中记载的不足之处。随庵采用这种治书方法来进行校讎,所蕴涵的学术性就更为明显了。

此外,《徐乃昌日记》中也记载了一些当时采集、编纂南陵碑志史料的情况:

昨舜臣南陵来书:“孙子彬派拓碑人盛姓于廿二日到南,大雪天寒,稍后两日施工。”^②

南陵修志局来书,云志馆编辑脱稿尚无定期,其已成之门类,现正由司书生誊写,并寄来新拓各碑九十种。^③

从编纂《南陵县志》的全过程来看,以随庵为首的编辑团队在实施该工程之前确实做了大量的实际调研,看来史料得来之艰辛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将那些不被史书所记录而又确实存在的珍稀石刻碑志辑录出来,更加突出显示是书的史料价值。

二、随庵对于宋人碑志之校讎研究

随庵对于宋人石刻碑志史料的收藏与校讎成果,也多翔实地记录在《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和《南陵县志·金石志》中,涉及的内容包括了城池、古迹、坛庙、陵墓和科举教育等。这里仅以《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著录的稀见宋人史料为例作如下分析。

第一、对于宋人科举碑志的研究,是随庵校讎中的一大特色。其中所藏三块志碑最值得宋代教育史的研究者重视:其一是立于滁县醉翁亭梅瑞堂后壁的《绍兴十八年进士题名记》,其二是立于古和县文庙中的绍定元年《和州登科题名记》,其三是立于当涂县旧太平府学中的宝祐三年《重立进士题名记》。这些碑志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宋代安徽地区实施科举教育的实际情况,是属于

①余谊密修、徐乃昌纂:《南陵县志》卷四十四《金石》,民国间徐氏自刻本。

②稿本《徐乃昌日记》民国十年辛酉(1921)元月廿八日之记载。

③稿本《徐乃昌日记》民国十年辛酉(1921)五月初廿七日之记载。

断代科举教育史研究中最值得参考的珍贵文献。

随庵研究科举史与前人有着不同处,就是善于从石刻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史料来进行校讎,其中《和州登科题名记》就属于经他精心校讎过的石刻碑志。此碑是记载天圣二年(1024)宋郊榜至咸淳七年(1271)张镇孙榜的翔实史料。随庵云:“拓本连额高五尺五寸,广四尺,五截刻。上记三十二行,行十七字,字径八分。下题名四截,行字不等。额二行,行三字,均正书。”^①从史料性质看,随庵在作校讎研究中依据的史料来源于拓片。按其性质论,拓片亦是属于出土文献的一部分,并且与原碑一样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当然初拓本更接近于原碑。在宋代,金石学家也注意到了此文献的珍贵性,并逐渐加以蒐集、整理和研究,形成了一个时代史科学方面的典型特色。依据拓片来考证宋代和州科举成就,一方面是体现了随庵对传统研究方法的继承,另一方面是通过校讎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其《校勘记》之叙述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宋《和州登科题名》为绍定元年王相记,上官涣酉正书,始天圣二年宋郊榜朱莹,终咸淳七年张镇孙榜宁子真,今以《州志·选举表》校之,如刘公晋、丁兴祖、宋汝明等三人列于绍兴四年,而碑刻则为绍圣四年,上官祝、沈虞卿二人列于重和元年,而碑则为政和八年。其题名朱略碑作朱畋,张衡碑作章衡,齐湛碑作齐湛,叶洽碑作叶祖洽,贾安泽碑作贾安宅,朱侔碑作朱畴,陈嘉谟碑作陈嘉谋,王知章碑作王知彰、王昂碑作嘉王,均可证《州志》之误。^②

随庵自1931年初参与筹划并编辑《安徽丛书》以来,就曾对该地区所藏珍贵文献(文物)进行过细致调研,估计刻于绍定元年并出土于古和县文庙中的《和州登科题名记》拓片就是在此时征集来的。将出土文物(文献)同传世文献进行讎校,是近代学者提出并常使用的一种新方法。徐氏言“均可证《州志》之误”,就是对此方法的积极实践。

从碑志校讎中来考证宋代人物,是随庵乡邦文献整理中的又一特色。以他的学术成就看,随庵把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乡邦文献的整理编纂中,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所纂《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卷三、四中就涉及诸多宋代人物,诸如《和州登科题名记》碑第二截中所载天圣八年王拱辰榜沈立^③等。

第二、作为近代著名居士的徐随庵,整理宋人佛学石刻也是其一大嗜好。《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涉及到的宋人佛学史料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碑志。其中有建隆元年(960)《澄悟禅师碑》,大中祥符三年(1010)《梅山崇明院碑》,天圣五年(1027)《天圣院佛会人名碑》,元符二年(1099)《华严寺造

①《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四。

②《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四。

③《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四。

释迦罗汉石座记》，乾道七年（1171）《石龙庵记》和《会圣思公严主辞世颂》等。对于这些珍贵碑志的辑录与考证，是他整理宋碑的一大特色，诸如他在校讎刻于乾道七年《石龙庵记》一文时说：“按（嘉庆）《南陵先志》，石龙山在县西南二十里，宋邓道先建庵，其上昌永有记，俗名‘庵山口碑’，尚存。昔年纂修县志，以此记遍访乡人，金谓：庵址已失，不可踪迹。及编《金石志》，仅据艺文录入。甲戌夏五，张和声、李星煌、万子康三君访得于山口徐村落中，以拓本见贻，亟录之。”^①可知随庵并不满足于仅据县志逐录碑文，而是积极寻访石刻本身与其拓本。其二则是经幢。《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中载有《邵延兴造尊胜幢》、《怀远信等造心经幢》、《许从等造香炉幢记》、《陈文政造开山和尚塔记》、《观自在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经》、《兴化寺郑整修塔记》等24条史料，均是揭示该地区佛学盛况的珍贵历史文献。另从历来编纂《安徽通志》中揭示的释学文献来分析，历史上安徽地区不仅寺庙林立，而且各道场香火亦颇旺盛，看来随庵重视该区域内的佛学史料校讎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随庵所纂《南陵县志·金石志》中所收宋代碑志有《宋青阳桥记》、《宋石龙庵记》、《宋重修大龙陂永丰陂记》和《宋修儒学记》。在随庵编纂此书之前，这些碑志已经全佚失了，他曾于《宋修儒学记·校勘记》中叙述到：

右记宋嘉熙间平江知府王遂撰文，碑石久佚，据《徐志·艺文志》录补。按杜范以嘉熙二年差知宁国府，三年至郡，四年还朝。记云嘉熙二年，当是四年之误。今碑已佚，无可考证矣。^②

从校勘记录看出，实事求是应是他的校讎主导。史为明镜，既鉴照往事，也能指导今日的研究，岂能有所偏颇。他在整理乡邦文献时是以原始文献为依据，不仅交代了所引史料的出处，而且指出前贤研究中的不足，这样扎实的石刻碑志校讎是随庵的一个研究特色，也应该同他的版本目录学成就一样得到学林重视。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大学图书馆

①《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四。

②《南陵县志》卷四十四《金石》。